

当代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研究

——徐桂华文集



复 旦 学 人 文 库

怎样正确估量当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
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

——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

可行的社会主义股份制

对迈向国际经济舞台的一点思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应重视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创新

徐桂华 著

Xu guihua

 復旦大學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研究

——徐桂华文集

徐桂华 著

Xu guihua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研究:徐桂华文集/徐桂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
(复旦学人文库)
ISBN 7-309-04313-8

I. 当… II. 徐… III. 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124 号

当代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研究——徐桂华文集

徐桂华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苏荣刚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9.5 插页 3

字 数 545 千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4313-8/Z·46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桂华，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年12月生，男，江苏扬州人。1951年1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195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期间，曾一度调至解放日报从事新闻业务工作和报纸领导工作，并曾出任《世界经济文汇》杂志主编十数年。现任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并任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世界经济文汇》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编委。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比较经济理论和当代中国经济。曾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省市级的重大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课题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对策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探》、《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产权制度研究》、《共有制与邓小平理论》、《共有制与股份制》、《共有制与国有企业改革》、《各国证券市场概览》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有多项学术研究成果获奖，其中《论“内外循环，双轨联动”的战略构想》一文获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优秀论文特等奖。

前言

本书收集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选集。除了必要的文字校勘外,内容均未作修改,以保持文章的原貌。

我是1951年1月入伍,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的。195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响应党和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于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65年被调至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记者、编辑,并长期担任党的工作,包括党支部书记、党委会委员等。当时报社未设编委制,是党委制,党委直接管报纸,因而我也一度参与了报纸的领导工作,分管评论和理论、文艺等各个专栏、专版,并分管夜班编辑部。直到1979年8月,在阔别了15年之后,我又回到复旦大学,继续我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之所以要简略地提到上面这段经历,是想表明,我是以调干生身份进入大学的,并有着十多年新闻报纸工作的实践锤炼,这对我继续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有莫大帮助和教益的。它使我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具有敏感性并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领导部门、实际经济部门和基层经济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有所跟踪;能较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理论更贴近现实,更直接地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服务;还有一点就是有较为宽阔的社会和理论视野,并涉猎较为宽广的研究领域;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在回到了书斋之后,又不至为书斋所局限。

收入本书的文章,共分四大部分,读者从目录中已经见到了,不再赘述。这里只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摘其要者作一些介绍,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让我们先来看一篇文章:《怎样正确估量当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我承担的国家体改委的一项重大课题的中间成果,首先向国家体改委上报的。负责跟我联系的理论司陈立同志在1987年3月12日的来信中说:“寄来的两篇文章,已在领导中传阅了。《怎样正确估量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我已编入《中国体改研究会调研资料》第4期(1987),已送国务院印刷厂去排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篇文章,将直接送中央领导参阅。”不久,这篇文章又被国家体改委主办的《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7年第8期(6月26日出版)全文转载。如果说《调研资料》主要是送中央领导参阅的话,那么,这里的《内部参考》发行面就比较广,各省市

体改办及各学术部门和单位都可见到^①。一次,在与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王琢见面时,尽管他比我年长,但他却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的那篇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作,我读了许多遍,写得太好了,真正是大手笔,每次阅读都像读经典著作那样,几乎通篇被我画满了红线……这里,我并不想炫耀什么(在比较熟识的学人之间,玩笑溢美之词是很多的),只是想表明,这篇文章不仅已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送中央领导参阅,而且在理论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让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对迈向国际经济舞台的一点思索》。这篇论文是针对当时风行一时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论”而发表的,刊登在1988年3月2日《解放日报》“新论”专版上。《解放日报》在发表本文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我国怎样更好地进入国际经济舞台?这篇文章提出了一条与‘大循环’说不完全相同的思路,代表了经济理论界的一种见解,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论文发表的第二天,共同社作了报道;随后,香港的《报刊消息》作了转载;国内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该文收入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论文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还被收入权威的中国当代思潮丛书中的《中国当代经济思潮》一书,在该书“改革反思与探索”一栏中共收入6篇文章,本文是其中的一篇。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在上述《一点思索》一文的基本立论基础上,对内容作了扩展,草成了《关于“内外循环,双轨联动”的战略构想》一文,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1988年第4期(8月出版)上。1988年10月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该论文经专家评审定为入选论文,我本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1989年1月该论文被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为“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在情况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这篇获奖作品。他说:“在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难点。这次入选的许多论文抓住了改革中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徐桂华同志的《关于‘内外循环,双轨联动’的战略构想》一文,针对1988年初社会上广为宣传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从正面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了‘内外循环,双轨联动’的战略构想。既吸取了大循环论的合理内容,又明确了参加大循环应以实现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为基础。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反响”。

读者如果不嫌冗长,请再随我看一篇文章:《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这篇文章是由我主持并执笔撰写的上海市体改办和体改研究会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入手,写成了全面论述

^① 顺便提一句:这篇文章还在《文汇报》内刊《理论探讨》1987年第2期全文发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文,甚至可以说是一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宣言书。在研究成果上报后不久我就去美国访问了,后来由于评奖的需要,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金志同志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介绍了这篇文章当时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她是这样写的:

“1990年11月,复旦大学经济系徐桂华教授为上海市体改办和体改研究会完成了一项重点研究课题,题目是:《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在有众多专家参加的评审与研讨会上,受到一致好评。大家认为这份研究报告不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不论在理论的超前性和新型方法论的运用上,都显示出独特的成就。而且文字生动流畅,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很有说服力。尤其可贵的是,报告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入手,演化成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题研究报告。这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在当时的理论学术界是很鲜见的。更何况当时的大气候是:市场经济观点正在遭到批判。

“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为准备全国体改理论研讨会,要求上海市体改办报送材料。我们随即选送了几份材料,其中包括徐教授的上述报告(本来还邀请徐教授出席会议,因徐教授不在国内而未能出席)。这份报告,立即受到国家体改委的重视,要求打印100份送交大会筹备组。1991年全国体改理论研讨会暨体改研究会年会于10月在武汉召开。上海由贺镐圣同志和我出席。与会后就听说国家体改委顾问、党组书记、全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安志文同志在徐教授报告上有个批示,大意是:这份报告值得一读,建议向大会推荐。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在同贺镐圣同志和我交谈时说: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争论了好多年争不清楚,看来这篇文章(指徐教授报告)讲清楚了。在大会发言中,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四川体改研究会会长林凌同志、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同志都十分赞扬徐教授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有的代表没有拿到这份报告,纷纷向我们和大会秘书组索要。总之,该报告在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1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徐教授的研究报告基本上被全文收录^①。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1992年4月,‘1992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安徽徽州召开,我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安志文同志在同上海代表的长谈中,再次提到徐教授的研究报告,他说,那篇文章我读了好多遍,这次临来开会前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本次会议的一些文章在深度上没有超越那篇文章。有的文章在

^① 仅在计划与市场“结合度和结合方式的选择”部分稍有删节。全文见1991年12月付梓出版的拙作《比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探》,第221—262页。

基本点上有些后退。借此他分析与批评了一些文章的基调。安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包括体改委理论司综合处处长张丽娜同志告诉我:安老在体改委会议上讲话,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要大家好好学习和研究。

“我本人曾在上海市体改办工作十多年,原任市体改办综合处副处长,研究室副主任,上海市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以上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这里,所以要全文引用这份材料,同样也不想借此炫耀什么,只是想如实地表明《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一文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一篇学术论文的范围,它不仅对理论界,而且对领导部门和实际经济部门的决策层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由这篇文章反映出的我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和观点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我想再介绍两件事:

其一,1990年11月4日至7日,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在北京召开“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会前,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教授在将会议通知传真给我时,在眉批上附言说:“我委主任陈锦华同志^①对这个研讨会十分重视,指示我们请一些理论上有所造诣、对国内外实际也有所了解、有真知灼见的同志来共同研讨,希望您一定拨冗出席为盼。”一方面,因为江春泽副司长是我大学的老师,真所谓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我刚好完成了上述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课题,也不用作多少准备,就可谈谈我的看法,于是我欣然赴会了。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四个问题,即什么是市场经济;我们为什么必然要选择市场经济;我们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时东欧已在巨变,苏联还未解体,我鲜明地提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必然要选择的市场经济,不应是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而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国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当我谈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即中国有条件作出主动选择,而有可能避免被动选择时,我一看手表,规定发言30分钟的时间已到,我说,好,为了遵守会议纪律,就不说下去了。这时,出席会议的陈锦华主任连忙说,不,不,你说下去,说下去。于是,我接着就解释了所谓主动选择,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和大趋势,由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主动作出选择,选择市场经济;所谓被动选择,就是像某些东欧国家那样,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不选择市场经济,结果由别人上台代替他们作出选择,使党和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会后,有的朋友对我说,你的发言很大胆,不过,看来陈锦华主任对你的发言还是很感兴趣的。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约有30名专家学者,包括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想必大家对这次会议

^① 当时陈锦华同志刚刚于不久前受命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

应该是有印象的。

其二,1991年初,我去美国访问。先到美国的西部,在加州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我访问了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出面接待我的是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钱颖一教授。交谈中很自然地谈到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在美国发表的新著:《通往自由经济之路》。在这本新著中,科尔内断言: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无非是想寻求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市场机制是私有经济的自然调节者,是私有经济存在的自然方式,它与公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人们又想引进市场机制,又想维护公有制,包括国有制,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不论在波兰、匈牙利,也不论在中国和苏联,这种改革都已宣告失败,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路,即他所谓的“自由经济之路”。在议论中钱颖一坚持要先听听刚从国内来美的国内经济学者的看法,于是我只好先表明我的看法。我说,本来,我们国内经济学同行对科尔内教授都很尊重,他的《短缺经济学》及其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有着良好的影响。可是,就科尔内教授在这本新著中的某些观点而言,尽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起了“轰动效应”,而我本人却不敢苟同,我甚至认为科尔内教授走得太远了,他的结论也为时过早,苏联我不敢说,至少在中国还在试验。在我谈了看法之后,钱颖一说道:我想,徐教授肯定知道我同科尔内教授的关系(钱颖一在哈佛大学师从科尔内教授,科尔内是他的博士导师),不过,我要说,学生不一定全部同意导师的观点。如果一定要问我个人的观点,我倒比较倾向于同意徐教授的看法。随后,他还向我介绍,在美国(如在伯克利),甚至有的教授至今还在坚持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过他们的处境都很艰难。几个月后,我去了美国的东部,在纽约州立大学见到了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纽伯格,他热情地请我去一家中国餐馆用餐,席间我们也谈及了上述科尔内的新著,他也表示同意并赞赏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以传统的苏联体制为一极,以弗里德曼(即指新自由主义——引者注)为另一极,那么,未来的世界不可能是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很可能是在这两极中间的某个地方。我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这也表明,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不同意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不赞成走所谓自由经济之路的也大有人在。

收入本书的部分文章是合作的成果和产物,这里要感谢各位合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和在将文章收入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和宝贵支持。要再次感谢蒋学模教授和葛霖生教授,他们二位同意我将他们为我的拙作《比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探》一书写序言收入本书。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高若海总编和苏荣

刚副编审,没有他们的费心尽力,本书是无法顺利出版的。这里,我还特别要向我的夫人黄义兰女士表达我的深深的谢忱,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管,没有这一条件,恐怕我也写不出那么多篇文章,当然出版文集也就无从谈起了。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书中肯定会留有许多谬误或疏漏之处,这一概由我个人负责,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徐桂华

2004年10月28日于复旦园

目 录

一、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工业商业都要有一点竞争	3
经济改革的根本关键是什么?	8
怎样正确估量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12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	21
正确认识马恩关于无商品社会主义的论述	24
关于社会主义“融合经济”的探讨	27
论股份经济的性质、意义和实施战略	39
股份制作用机理剖析	50
可行的社会主义股份制	54
对迈向国际经济舞台的一点思索	66
关于“内外循环,双轨联动”的战略构想	71
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 ——“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	88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思路	116
公有制实现形式研究	125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34
我国农地制度的产权分析及其变革方向的探讨	146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及发展中西部经济的基本思路	154

二、比较经济理论与比较经济体制研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史的探索	165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类型及其比较	174
兰格“模拟市场”模式评析	184
布鲁斯的“分权”模式评析	193
奥塔·锡克“宏观分配计划”模式评析	206
略论苏联经济理论对经济改革的影响	230
波兰的经济困境及其主要教训	241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	251
南斯拉夫联合劳动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259
民主德国组建大型联合企业的理论与实践	275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284

三、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与对策建议

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	293
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分析	297
上海尽快建成东方大港的自由港战略	302
上海加快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推进战略	306
上海搭建商贸大舞台的开放带动战略	310
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圈形”战略	314
上海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预测	327
上海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336
上海国有企业率先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操作性方案研究	339

四、新经济与经济学理论的若干研讨

论新经济及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363
新经济、“知本”与管理新趋势	372
论发展型管理理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377
学习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论	385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形式问题的探讨	392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初探	
——兼谈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	39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421
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	429
经济学应重视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创新	441

五、附 录

《比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探》序一	457
《比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探》序二	460

一、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工业商业都要有一点竞争

“工业要有一点竞争，商业也要有一点竞争”。

这是薛暮桥同志在今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的《利用价值规律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一文中提出来的论点，有些同志对此大为惊奇，甚至把它看成异端邪说。在这些同志看来，资本主义有竞争，社会主义怎么可以有竞争呢？

把竞争同资本主义划等号，以为竞争跟社会主义不相容，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影响很深。薛暮桥同志文章中的论点，打破了这个禁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了明确这个问题，这里谈一点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竞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竞争并非自资本主义始。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在有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地方，就开始有竞争。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就处于有利地位；反之，就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就引起了竞争。可见，竞争是同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竞争同社会主义也不是绝对不能相容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而是有竞有争，生机勃勃。恩格斯说过：“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①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竞争已不复存在了，但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消费力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国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两种形式，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一点竞争，有什么值得奇怪呢？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承认必须利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5页。

价值规律的作用,包括价值规律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又不承认必须有一点竞争,这就像又要利用水力发电,又不准水位有落差一样,岂不是十分荒唐吗?

没有竞争是一大弊病

为了进一步认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一点竞争的必要,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济生活的现实吧。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弊病,就是缺少竞争。没有竞争,各项经济活动就“活”不起来,就不可能发挥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没有竞争,生产发展缓慢、技术落后、市场呆滞、供需脱节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扭转。就上海的情况来说,有的产品是独家生产,无人竞争,市场上又供不应求,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怕嫁不出门”,你不要有人要,上海不要外地要,以致造成这些单位老大自居,质量低劣可以不思改进,花色陈旧可以不去翻新,群众意见再大,依然可以我行我素,笃定泰山。这岂不就是没有竞争所造成的恶果?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产品有两家或者几家工厂生产,并且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竞争,那些以“老大”自居的单位,恐怕就很难维持下去了。有的产品虽非独家生产,但由于实行统购包销制和统一作价制,实际上变成了“独家经营”。生产单位以产定销,商业批发部门统购包销,零售商店有啥销啥,这样,消费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当然更谈不上“择优录取”了。正是由于没有一点竞争,所以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死”得很,造成产销之间的严重脱节。群众需要和欢迎的适销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甚至长期脱销;群众不那么需要和欢迎的产品,却充斥市场,大量积压。特别是由于采用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往往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一面大量积压,一面还在扩大生产。上海有十多家手帕厂,因为手帕销路不畅,库存积压高达四千多万条,但这些手帕厂目前仍以每月生产三百多万条的速度在扩大库存。半导体收音机的库存已达一千一百多万台,今年居然还将有三百多万台生产出来。类似这样的事例,真可谓举不胜举。对于这样的情况,工商企业都不负经济责任,包袱让国家背。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现象吗?总之,由于没有一定的竞争(当然还包括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产与销、供与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脱销的长期脱销,积压的大量积压,要上的上不去,要下的下不来,结果是国家受损,生产受害,群众受苦,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要求,给经济工作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竞争的性质改变了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竞争有原则的区别。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